

价值累加理论视角下萨赫勒 恐怖主义问题探析

——以尼日尔蒂拉贝里地区为例

齐 赵 园 徐 佳 欣

内容提要 近年来，由于萨赫勒中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恶化，位于尼日尔西北部的蒂拉贝里地区遭受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严重。2018年以来，蒂拉贝里地区恐怖袭击事件频发，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滋生发展是政府羸弱、农牧民矛盾、族群冲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解决该地区恐怖主义问题不仅需要国内外军事力量的联合打击，还需要尼日尔政府主动发挥治理和调节作用，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缓解各种矛盾，逐步实现稳定与发展。基于价值累加理论分析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问题，有助于深入分析当地复杂的安全局势，为尼日尔乃至萨赫勒地区安全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萨赫勒 尼日尔 地区安全 恐怖主义 价值累加理论

作者简介 齐赵园，西安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教授（西安 710128）；徐佳欣，西安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硕士研究生（西安 710128）。

引 言

2010年中东剧变后，北非地区陷入严重的政治动荡。“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南部分支以马里东北部基达尔区（Kidal）为跳板，逐步向阿尔及利亚南部、尼日尔西部和北部、毛里塔尼亚

南部、马里北部和东部扩张。^① 为了稳定萨赫勒地区安全局势，自 2013 年起，法国先后发动“薮猫”行动（Opération Serval）和“新月形沙丘”行动（Opération Barkhane），联合萨赫勒五国集团（G-5 Sahel）共同打击恐怖组织与极端势力。然而自反恐行动开展以来，该地区安全局势未见明显好转，恐怖主义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开始向邻近的几内亚湾国家蔓延。2020 年以来，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相继发生军事政变，两国与法国关系急转直下。2022 年法国被迫从马里撤军，并结束“新月形沙丘”行动，随后又于 2023 年 2 月结束在布基纳法索的“佩刀”行动（Opération Sabre）。

在反恐行动接连遇挫后，法国将目光投向其在萨赫勒地区“最后的盟友”——尼日尔。该国地处萨赫勒中部地区，北邻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西与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接壤，东与乍得毗连，南同尼日利亚和贝宁交界，是恐怖主义向几内亚湾甚至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扩散的必经之地，该国安全形势关系到非洲和平与稳定的大局。自 2022 年从马里撤军后，法国就计划同尼日尔加强反恐合作，在该国境内重新部署军队，并重启“新月形沙丘”行动。然而，尼日尔及其邻国马里、布基纳法索经济社会治理问题严重，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地区反恐前景令人担忧。

近年来，位于尼日尔与马里、布基纳法索交界处的蒂拉贝里地区（Tillabéri）是受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频繁遭到“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Jama'a Nusrat ul-Islam wa al-Muslimin, JNIM）、“大撒哈拉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the Greater Sahara, ISGS）等恐怖组织侵袭。蒂拉贝里地区安全局势已经引起国外学者关注，但现有研究还未对该地区恐怖主义发生机制和具体演进过程作出系统性解读。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依据美国社会学家尼尔·斯梅尔塞（Neil Smelser）提出的“价值累加理论”（Value-Added Theory），对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问题进行探究。斯梅尔塞认为，解释集体行为不能单纯地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而应该将集体行为与社会结构因素联系起来。所有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由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触发性事件、有效动员、社会控制能力这 6 个因素共同决定。他着重关注社会结构因素，同时又保留了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内核。将价值累加理论引入恐怖主义研究，就是力求综合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社会心理两个维度，尝试论述恐怖主义的发生过程，解释其中的内在逻辑。^②

① 陈阿龙：《中东剧变以来非洲萨赫勒地区安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2 年，第 2 页。

② 董天美、张友国：《价值累加理论视角下的恐怖主义发生机制研究——以中亚国家为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 年第 5 期，第 104 页。

另外，有必要对恐怖主义和激进化的概念进行阐释，厘清激进化与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激进主义的提法早已有之，一般是指支持进行全面彻底的政治或社会变革的观点、想法和原则，与保守主义相对。^①而激进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以极端暴力为手段，以政治诉求或社会改变为目的。^②其行为结果最终导向极端暴力活动，甚至恐怖主义。一般认为，激进化是恐怖主义形成的前提与基础，是恐怖主义形成的第一阶段。^③因此可以说，研究社会运动到恐怖主义的激进化过程，就是探究个体或群体如何接受极端思想，逐渐由平民转变为恐怖分子，并最终采取暴力行为、发动恐怖袭击的渐进发展过程。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蒂拉贝里地区的安全现状；第二部分阐述将社会运动理论引入恐怖主义研究的可行性，并介绍价值累加理论；第三部分以该理论为分析框架，深入剖析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的发生机制和演进过程；第四部分结合地区安全现状提出恐怖主义治理对策。基于价值累加理论解读蒂拉贝里地区面临的安全困境，有利于通过该地区安全问题透视整个萨赫勒地区面临的类似困境，进而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萨赫勒地区安全局势，为地区安全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现状

中东剧变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通过其南部分支在阿尔及利亚南部地区、毛里塔尼亚、马里东北部地区开展恐怖活动，并于 2017 年 3 月与“马西纳解放阵线”（Katibat Macina）、“伊斯兰卫士”（Ansar Dine）和“哨兵”组织（Al - Mourabitoun）一起重组为“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④并逐渐成为萨赫勒中部地区最活跃的极端组织之一。此外，“哨兵”组织前领导人阿德南·阿布·瓦利德·萨赫拉维（Adnane Abou Walid al - Sahraoui）于 2015 年 5 月宣布效忠“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组建“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在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边境地区活动。自 2018 年 2 月以来，在马里亲政府民兵组织阿扎瓦德拯救运动（MSA）和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GATIA）的协助下，法国“新月形沙丘”特遣队以“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为主要打击目标，加强在马里

① 任延涛、朱小艳：《西方恐怖主义激进化的主要理论述评》，《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7 年第 5 期，第 25 页。

② 任延涛、朱小艳：《西方恐怖主义激进化的主要理论述评》，第 26 页。

③ 任延涛、朱小艳：《西方恐怖主义激进化的主要理论述评》，第 25 页。

④ 陈阿龙：《中东剧变以来非洲萨赫勒地区安全研究》，第 75 页。

东北部加奥（Gao）和梅纳卡（Ménaka）地区的军事行动。^① 随着反恐力度增强，恐怖分子逐渐向尼日尔蒂拉贝里地区扩散，导致该地区安全局势逐步恶化。

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发布的报告《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lobal Terrorism Index*）显示，尼日尔恐怖主义指数已经由2014年的全球第58位攀升至2018年的全球第23位，并于2022年跃居全球第8位。^② 2007—2022年，该国共有1842人死于恐怖袭击。^③ 其中2021年是近十年来尼日尔恐袭致死人数最多的一年，死亡人数高达595人，是2020年的两倍（见图1）。而蒂拉贝里地区又是尼日尔境内恐袭事件高发区，2021年该地区发生的恐袭事件数量占全国总数的一半，死亡人数相比2020年增加了一倍多，占全国总数的61%。此外，在2021年全球最致命的18起恐袭事件中，有两起发生在蒂拉贝里地区。恐怖分子分别在1月和8月袭击了蒂拉贝里的两个村庄，共造成107人死亡，17人受伤。^④

目前，“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是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三国交界地带最危险的极端组织。2021年，该组织共造成尼日尔境内超过560名平民死亡，占尼日尔全年恐袭致死人数的近80%。^⑤ 在尼日尔，大约每三次“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恐怖袭击就有两次针对平民，尤其是在蒂拉贝里地区，该组织在蒂拉贝里

-
- ① Héní Nsaibia, “Targeting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the Greater Sahara (ISGS),” ACLED, March 21, 2018, <https://acleddata.com/2018/03/21/targeting-of-the-islamic-state-in-the-greater-sahara-isgs/>, accessed February 14, 2023.
- ②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4: Measur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2014, <https://www.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15/06/Global-Terrorism-Index-Report-2014.pdf>, accessed November 20, 2022;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8: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November, 2018, <https://www.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8/Global-Terrorism-Index-2018.pdf>, accessed November 20, 2022;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2: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March, 2022, <https://www.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22/03/GTI-2022-web-09062022.pdf>, accessed November 20, 2022.
- ③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3: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March, 2023, <https://www.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3/GTI-2023-web-170423.pdf>, accessed April 1, 2023.
- ④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2: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https://www.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22/03/GTI-2022-web-09062022.pdf>, accessed November 26, 2022.
- ⑤ Héní Nsaibia, “10 Conflicts to Worry about in 2022: The Sahel,” ACLED, 2022, <https://acleddata.com/10-conflicts-to-worry-about-in-2022/sahel/>, accessed December 6, 2022.

地区的活跃程度是其他伊斯兰激进组织的 10 倍。^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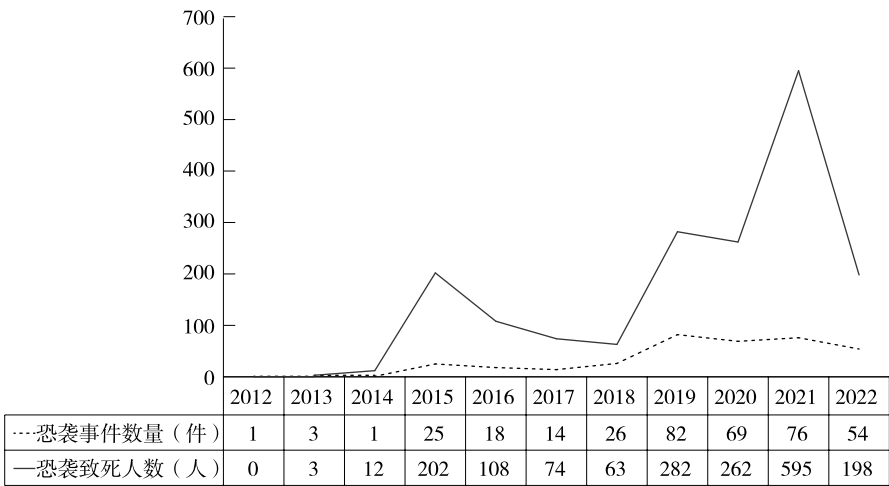


图 1 2012—2022 年尼日尔恐袭事件数量及致死人数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3* 数据整理而成。

如今，恐怖主义是蒂拉贝里地区最主要的安全威胁，并且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已经严重威胁到民众的生命安全，不仅进一步加剧了萨赫勒地区安全治理难度，也成为尼日尔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新难题。若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蔓延，萨赫勒中部地区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沦为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的地盘，并严重威胁非洲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斯梅尔塞“价值累加理论”

近年来萨赫勒地区“越反越恐”的局面反映出国际社会恐怖主义治理的不足。曾向红指出，国际恐怖主义仍在强劲发展的趋势说明目前的反恐路径仍然存在明显不足，突出表现为集中关注从立法和执法层面上治理恐怖主义，而忽视了消除或改变导致恐怖主义滋生和发展的结构性条件，^② 因此无法彻底扭转恐怖主义的整体发展态势。即便法国在萨赫勒地区的军事行动取得一定进展，但域内国家过度依赖国际社会的军事援助，长期忽视自身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治理，因此

① “Islamic State in the Greater Sahara Expanding Its Threat and Reach in the Sahel,” 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December 18, 2020, <https://africacenter.org/spotlight/islamic-state-in-the-greater-sahara-expanding-its-threat-and-reach-in-the-sahel/>, accessed December 26, 2022.

② 曾向红：《恐怖主义的整合性治理——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1 期，第 76 页。

该地区安全局势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反而呈现出“越反越恐”的发展趋势。

社会运动理论可为恐怖主义治理提供有新意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恐怖主义是一种集体现象，即使是独狼式恐怖主义也具有重要的集体属性，故恐怖主义可被视为人类集体行为的一种类型。^① 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价值累加理论就是一种结构功能取向的集体行为理论。斯梅尔塞认为，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的发生同时受 6 个因素影响。一是结构性诱因，某些社会的结构特征更有利于集体行为的产生。二是结构性怨恨，即在一定的结构性因素下，人们会产生相应的结构性怨恨、被剥夺感或被压迫感。三是一般化信念，指人们对某个问题的认知及其解决途径产生了普遍认同。四是触发性事件，集体行为必须由一个或数个触发性事件来引爆。五是对参与者的有效动员，动员那些受影响群体，让他们参与行动。斯梅尔塞认为这 5 个因素之间存在递进关系，只有在前一个因素已经具备的前提下，后一个因素才可能发生，且随着累加因素越来越多，集体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大。除上述 5 个因素外，还存在第 6 个因素——社会控制能力，即动用社会能力阻止集体行为的发生。这个因素可以从上述 5 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入手，与其他 5 个因素的作用相反，其功能是阻止集体行为的发生。在斯梅尔塞看来，只有上述 5 个促进因素同时具备，并在与社会控制这个阻碍因素的角力中胜出，集体行为才有可能发生（见图 2）。^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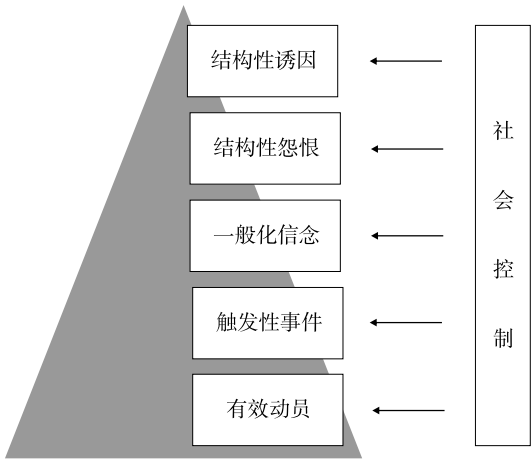


图 2 斯梅尔塞价值累加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总体来看，相较于以前任何一种集体行为理论，价值累加理论的内容更为丰

① 曾向红：《恐怖主义的整合性治理——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第 77 页。

②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02 页。

富，逻辑也更为严整。^① 然而，一国反恐前景不确定性极大，该理论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斯梅尔塞把促成社会运动的各个因素机械地排成一个序列，把它们当作在时间上有固定顺序的、不断累积的一套充要条件。^② 但实际上，集体行为的发生并不完全遵循这样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模型中的六大因素也不都是集体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例如，赵鼎新指出，斯梅尔塞模型强调触发性事件在社会运动产生过程中的重要性，事实上，目前西方许多社会运动的产生主要是一些社会运动专业人员寻找和创造议题的结果，而不是产生于触发性事件。对于社会控制能力下降这一因素，他也提到，在当前西方社会里，许多社会运动均已合法化，换句话说，社会或国家的控制能力如何，在这些运动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③ 由此可见，在现实社会中，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的发生并不完全符合价值累加理论。即便缺少某个因素，或者各因素之间并未严格遵循依次递进的参与顺序，集体行为仍然有可能发生。

本文认为，蒂拉贝里地区安全局势恶化是六大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但这一过程并不完全符合价值累加理论。其中，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和触发性事件 4 个因素依次递进、层层累加，构成恐怖主义发生演进的基本环节。而有效动员和社会控制能力下降则作为外部驱动因素贯穿这一过程，推动各个环节有序衔接，共同发挥作用（见图 3）。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的形成和演进同时受到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不能将其简单划分为几个依次累加的环节并完全分割开来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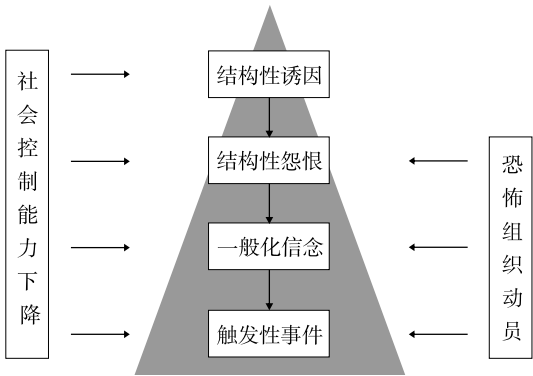


图 3 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激进化的演进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8 页。
②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6 页。
③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 66 页。

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的演进过程

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经历了矛盾累积的演进过程，受政府治理失效、农牧民矛盾、族群冲突、恐怖分子动员等因素共同影响。

（一）结构性诱因

斯梅尔塞认为，特定的社会结构为集体行为、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发生提供了特定的环境，使其具备发生的有利条件，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等，这些要件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稳定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一旦其中的某一要件无法达到民众的期待，社会就有可能失序。^①

自1960年独立以来，尼日尔经历多次政变，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2021年该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189，位列全球倒数第三。^②据世界银行统计，2012—2021年尼日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呈骤降趋势，由10.5%暴跌至1.4%（见图4）。2018年该国贫困人口比例高达50.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567.3美元。^③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近年来尼日尔经济困难持续加剧，贫困率由2019年的40.8%上升至2020年的42.1%。^④2021年该国共有超过1000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占总人口的41.8%。此外，随着萨赫勒地区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大批邻国难民纷纷涌入尼日尔境内。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截至2022年8月底，该国共有近30万难民和近35万流离失所者。^⑤

尼日尔经济多元化程度低，延续了殖民时期单一的经济模式，以农业为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农业年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但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萨赫勒地区气温升高，降水量减少，导致尼日尔植被覆盖率逐年下降，从1975

① 董天美、张友国：《价值累加理论视角下的恐怖主义发生机制研究——以中亚国家为案例》，第105页。

② UNDP, “2021/2022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September 8, 2022, <https://hdr.undp.org/system/files/documents/global-report-document/hdr2021-22overviewchpdf.pdf>, accessed February 15, 2023.

③ The World Bank, “World Bank Open Data Niger,”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niger>, accessed February 15, 2023.

④ 《尼日尔国家概况》，中国驻尼日尔大使馆网站，2022年1月20日，<http://ne.china-embassy.gov.cn/nrergk/>，访问日期：2023年2月15日。

⑤ The World Bank, “The World Bank in Niger,” March 23, 2023, <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niger/overview#1>, accessed March 28, 2023.

年至 2016 年该国沙地面积增加了 24.8%。^①与此同时，人口快速增长和粮食需求增加导致尼日尔不得不进行农业开垦。1975—2013 年，尼日尔耕地面积从 12.6% 扩大到 24.5%，增长了 94.2%，农业开垦主要在蒂拉贝里地区的山谷进行，那里的农田正在侵占传统牧场。^②总之，由于土地荒漠化和农业开垦，蒂拉贝里地区的牧场正在不断减少，为了争夺有限的土地资源，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而人口过剩和难民增多又导致该地区粮食危机持续加剧。截至 2021 年 9 月，蒂拉贝里地区共有近 60 万人面临粮食危机。^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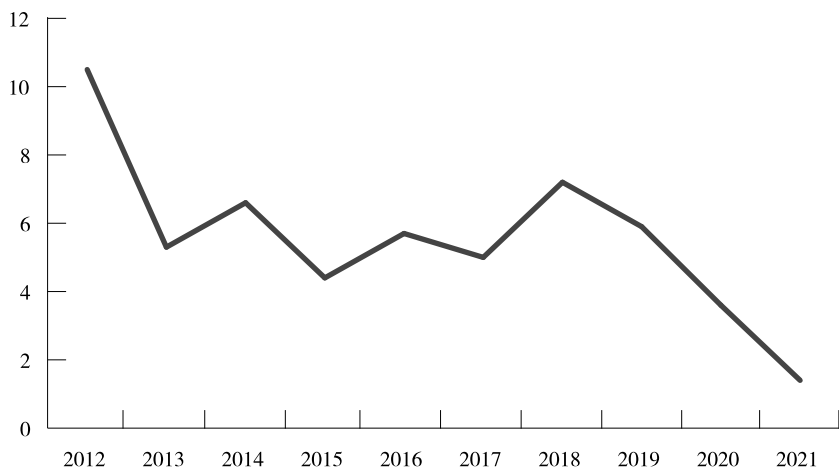


图 4 2012—2021 年尼日尔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单位: %)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而成。

(二) 结构性怨恨

社会秩序失衡后，人们便会产生相应的结构性怨恨，为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的发生提供温床。社会怨恨的起因基本来自两个途径：第一是利益的相对受损，即利益分化，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导致社会底层群体甚至部分中等阶层相对剥夺感增强。第二是利益的绝对受损，即在现实中，或因拆迁、或因征地、或因环境污染、或因移民搬迁等，个体或某一群体公民实际利益受损，且

- ① Marie Gagné, “Niger—Context and Land Governance,” Land Portal Foundation, August 23, 2022, <https://www.landportal.org/book/narratives/2022/niger#ref1>, accessed March 5, 2023.
- ② “Niger Land Problems,” Interactive Country Fiches, <https://dicf.unepgrid.ch/niger/land>, accessed March 5, 2023.
- ③ OCHA, «Niger Rapport de Situation (1 octobre 2021)», September 30, 2021, <https://reliefweb.int/report/niger/niger-rapport-de-situation-1-octobre-2021>, accessed March 5, 2023.

长久无法获得合理补偿或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①

尼日尔族群众多，豪萨人（Haoussa）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占全国人口的56%；杰尔马人（Djerma）是第二大族群，同样以农耕为主，占全国人口的22%；富拉尼人（Fulani）是尼日尔人数最多的游牧族群，占总人口的8.5%；图阿雷格人（Touareg）是第二大游牧族群，占全国人口的8%。独立后，尼日尔政府延续了殖民时期单一的经济模式，着重发展农业，大力开垦农业用地，导致耕地不断向蒂拉贝里北部扩张，逐渐侵占了游牧族群的牧场。由于土地荒漠化，富拉尼人和图阿雷格人则不断向南迁徙，寻找新牧场。因此，几十年来，为了争夺土地资源，农牧民之间时常发生暴力冲突。

为了缓解农牧民矛盾，尼日尔政府曾在1993年颁布《农村法典》，制定关于土地和水资源使用的法律条例。但有牧民组织认为该法典没有对牧民用地作出明确界定，只是赋予牧民对土地的次要使用权，因此仍然对牧民群体不利。此外，在许多政府官员看来，牧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不符合国家利益，这是因为游牧业本身具有极强的流动性，与农业、渔业和采矿业等使用本地资源的经济活动相比更难被监管和征税。^②因此，尽管牧民对国家的经济贡献很大，但是政府更倾向于牺牲牧民利益来保障农业生产。这样一来，作为少数民族的富拉尼人和图阿雷格人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受到政府忽视和农耕族群排挤。再加上耕地不断扩大的趋势不可逆转，游牧族群的土地使用权逐渐被剥夺，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他们对政府和农耕族群的怨恨情绪油然而生。

（三）一般化信念

一般化信念是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形成的关键因素。在集体行为发生之前，人们的结构性怨恨必须转化为某种一般化信念，即人们对某个特定问题的症结及其解决途径产生一个共同认识。一般化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再造、深化甚至夸大了人们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③

在蒂拉贝里地区，农牧民之间、牧民与政府之间、不同游牧族群之间积怨已久，而政府无力缓解各方矛盾，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游牧族群普遍感到被边缘化，对政府的怨恨情绪日益加深。例如，在后殖民时期，内部团结、文化独特的图阿雷格族被分割到不同国家，沦为跨界游牧族群。多年来，由于所在国政府对

① 朱志玲：《结构、怨恨和话语：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宏观条件形成机制研究——基于斯梅尔塞加值理论的思考》，《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93—94页。

② Matthew Pflaum, "Pastoralist Violence in North and West Africa," *West African Papers*, No. 31, 2021, p. 12.

③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65页。

图阿雷格人的忽视和经历多次自然灾害的冲击，图阿雷格人对所在国政府普遍不满，认为他们已经被边缘化或被抛弃，与所在国政府的积怨不断加深，并爆发多次冲突。^①

富拉尼人是另一个被边缘化的族群，他们不仅受到豪萨人和杰尔马人排挤，还遭到图阿雷格族武装分子的袭击。在怨恨情绪的驱使下，他们走上了暴力抵抗的道路。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起，一些富拉尼人开始效仿图阿雷格人，成立武装组织或加入雇佣军，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战斗力。2011 年底，马里北方的图阿雷格人成立反政府武装组织“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National Movement for Liberation of Azawad），随后发动武装叛乱。由于担心图阿雷格人加入反政府武装组织并获得武器，蒂拉贝里边境的一些富拉尼青年开始加入“圣战”阵营。在他们看来，“圣战”组织是“抵御图阿雷格人霸权的堡垒”^②。

正是由于怨恨情绪、被压迫感和被剥夺感不断加深，蒂拉贝里地区的游牧族群开始寻求各种自我保护的途径。在政府治理薄弱的边境地区，“以暴制暴”是唯一的生存法则。

（四）触发性事件

有了一般化信念，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的发生就不远了。但是，引发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的直接原因，往往是一个或数个触发性事件。^③ 马里危机爆发后，虽然萨赫勒地区安全局势逐渐恶化，但是尼日尔受邻国恐怖主义外溢的影响相对有限，安全局势基本可控，尚未成为恐怖主义重灾区。直到 2018 年，该国恐怖主义指数才开始攀升，恐袭事件增多，死亡人数亦随之增加。

2018 年初，由于法国军队加强在马里东北部的军事行动，“圣战”分子逐渐向尼日尔蒂拉贝里地区扩散，导致该地区安全局势明显恶化。2020 年 1 月，马克龙总统在 G5 国家反恐特别峰会（波城峰会）上宣布成立特遣部队，重点打击“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然而随着反恐力度进一步加大，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三国针对平民的暴力事件不减反增。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ACLED）分析指出，这一后果与安全部队侵犯人权的暴行有着密切关系。2020 年 2 月，安全部队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近 250 人的峰值，大约是 2019 年下半年

① 汪二款：《图阿雷格人“独立建国”问题的缘起、演进历程及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5 年，第 1 页。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 Frontière Niger – Mali: Mettre l’outil Militaire Au Service d’une Approche Politique », *Rapport Afrique*, No. 261, 2018, p. 8.

③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 65 页。

每月平均死亡人数的 10 倍。^① 由于反恐行动透明度低、问责过程不完善，安全部队内部普遍存在有罪不罚现象，不仅导致本土和外国军队侵犯人权的事件屡有发生，也降低了当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在蒂拉贝里地区，人们甚至认为“新月形沙丘”行动是图阿雷格人与道萨克人（Daosahak）在尼日尔和法国的支持下，对富拉尼人展开的种族清洗运动^②。由此可见，随着反恐力度加强，民众反而陷入更加严重的安全危机，对政府的怨恨情绪持续激化。

此外，新冠疫情也给当地脆弱的安全局势带来致命打击。为了应对疫情，尼日尔政府对牧业采取一刀切政策，关闭了 80% 的畜牧市场，禁止跨境游牧，限制境内游牧。在边境地区，牲畜被聚集在一起，给有限的放牧区和供水点造成巨大压力，导致许多牲畜染病，而出行困难又限制了牧群接受兽医治疗的机会。^③ 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农牧民之间、不同游牧族群之间的暴力冲突加剧。此外，畜牧市场关闭和饲料支出上涨导致蒂拉贝里地区大批牧民破产，游牧族群的怨恨情绪达到极点。为了获得基本的生存物资和安全保障，许多牧民只得投靠犯罪集团或极端组织，进一步为“圣战”分子在当地动员和扩散提供有利条件。

（五）恐怖组织动员

恐怖主义在蒂拉贝里地区的滋生和蔓延经历了上述四个阶段。在此过程中，恐怖组织的有效动员作为直接外因，不断推动一般化信念形成，并最终导致该地区陷入恐怖主义泥沼。

萨赫勒国家长期将边远地区的管理权交给当地的权力中间人，默许政府武装实施集体惩罚，授权当地部族武装自行处理冲突。政府对跨境犯罪和走私活动也采取放任态度，前提是这些活动没有威胁到政权稳定和国际盟友的利益。^④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敏锐地察觉到这些有利条件并加以利用。自成立以来，恐怖分子长期扎根在安全力量薄弱的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三国交界地区，通过实施本地化发展策略，该组织已经与当地某些族群建立了密切联系。

一方面，“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巧妙利用当地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怨恨情绪，不断发动针对平民的袭击，以降低民众对安全部队的信任度。此外，他们还

① Anna Schmauder, Zoë Gorman and Flore Berger, “Takuba: A New Coalition for the Sahel?” *Clingendael Spectator*, June 30, 2020, <https://spectator.clingendael.org/en/publication/takuba-new-coalition-sahel>, accessed March 10, 2023.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idelineing the Islamic State in Niger’s Tillabery,” *Africa Report*, No. 289, 2020, p. 8.

③ Loïc Bisson, “When Pandemic Meets Poverty: Pandemonium for Pastoralists in the Sahel,” *CRU Policy Brief*, July 2020, p. 3.

④ 陈阿龙：《中东剧变以来非洲萨赫勒地区安全研究》，第 100 页。

利用当地复杂的族群关系，通过充当“保护者”来拉拢和招募游牧族群。在蒂拉贝里地区，被边缘化的游牧族群经常遭到抢劫或绑架。为了赢得牧民信任和支持，恐怖分子会帮助他们找回被盗牲畜，或在发生暴力冲突时向他们提供保护。作为回报，“保护者”会向牧民征收“天课”，但对后者来说，与其遭到袭击丢失所有牧群，他们更愿意缴税，以换取保护和帮助。因此，“大撒哈拉伊斯兰国”首先赢得了当地游牧族群的忠诚，这些游牧民主要是富拉尼人，多年来饱受其他族群侵害。在当地，人们甚至认为“伊斯兰国”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土地纠纷并提供公共服务（如保护牲畜免遭掠夺）的执政机构。^①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它比政府和军队更加有用，能够履行更多职能。

另一方面，“大撒哈拉伊斯兰国”通过恐吓手段威胁和控制民众，以确保他们“绝对忠诚”。该组织领导人在当地建立线人网络，与尼日尔政府合作或不愿服从组织命令的地方领导人会被绑架或遭到暗杀，民众也因为害怕被报复而不愿透露恐怖分子的行踪。边境地区的一位部落酋长说，“当阿布·瓦利德的手下经过我们的地区时，我们没有报告安全部队，原因有两个：首先，我们认为安全部队不会采取行动；其次，我们害怕，如果那些土匪发现我们背叛了他们，就会杀了我们。”^②

正是在被动动员与主动动员、外部动员与内部动员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游牧民主动加入“圣战”阵营，并逐渐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建立了密切联系，而该组织也得以在当地不断渗透扩张，最终形成复杂的动态犯罪网。它不需要占领特定的城镇或村庄，而是可以动员整个边境地区的分散力量。一旦发出号召，几十名骑着摩托车的战士就会突然出现，朝既定目标发起攻击，并在攻击结束后迅速退回灌木丛。这种作战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伊斯兰国”行动的影响力和突击性。^③

（六）社会控制能力下降

社会控制能力是影响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外因。这里的社会控制能力主要是指国家通过暴力机器、法律、道德等对集体行为控制能力的强弱，主要工具包括警察、法院、媒体、宗教权威、社区领导者等，通常是通过威慑、调适、重新导向三种方式。^④一旦社会控制力下降，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就

①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idelineing the Islamic State in Niger’s Tillabery,” p. 5.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idelineing the Islamic State in Niger’s Tillabery,” p. 6.

③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idelineing the Islamic State in Niger’s Tillabery,” p. 5.

④ 董天美、张友国：《价值累加理论视角下的恐怖主义发生机制研究——以中亚国家为案例》，第 107 页。

会爆发。

为了遏制蒂拉贝里地区安全局势恶化趋势，尼日尔政府曾采取一些治理措施，但并没有取得显著效果。首先，为了缓解农牧民矛盾，政府在1993年颁布了《农村法典》，但在牧民看来该法典确认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优先于牧民”^①，这是不公正的。于是政府又在2010年颁布了《牧民法典》，以支持游牧民流动放牧。然而，该法典没有考虑到不同类型游牧民的生产需要，导致游牧民内部在土地使用权等问题上出现分歧。例如，为了保障来自其他地区的流动性强的季节性游牧民对牧区的临时使用权，法典进一步限制了牧区传统使用者的土地权利。^②如此一来，颁布《牧民法典》并没有达到缓解农牧民矛盾的预期效果，反而引出不同游牧族群在资源使用上的潜在矛盾。

其次，尼日尔政府曾呼吁加入“圣战”的牧民回归当地，承诺将他们纳入安全部队，并提供粮食援助。该项目由巩固和平高级管理局负责，主要针对被边缘化的富拉尼人，旨在为他们在安全部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重建他们对国家的信任，但结果令人失望。为了获得更多粮食援助，部落酋长夸大实际回归的战士人数；在安全部队招募过程中，许多富拉尼战士因“健康原因”被拒之门外。总之，由于贪污腐败和族群歧视，和平回归项目没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进一步加深少数民族的被压迫感和被剥夺感。

最后，在反恐问题上，尼日尔近年虽然积极开展联合反恐行动，但安全部队漠视民众生命，导致侵犯人权的事件屡屡发生，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反法情绪日益高涨，为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的动员提供了可乘之机。

综上所述，尼日尔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安全治理措施，但由于治理能力弱、政策执行效率低，安全局势始终没能得到有效控制。在反恐行动负面效应等因素刺激下，恐怖组织通过煽动民众的不满与怨恨情绪，不断招募成员、扩充势力，逐渐从蒂拉贝里北部向西南部渗透，最终导致该地区恐怖袭击数量上升，安全局势异常严峻。

（七）蒂拉贝里地区社会运动到恐怖主义的激进化演变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造成蒂拉贝里地区安全局势恶化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尼日尔政府无力解决当地冲突，且国家安全部队及其盟友（马里民

① Clare Oxby, “Will the 2010 ‘Code Pastoral’ Help Herders in Central Niger? Land Rights and Land Use Strategies in the Grasslands of Abalak and Dakoro Departments,” *Nomadic Peoples*, Vol. 15, No. 2, 2011, p. 54.

② Clare Oxby, “Will the 2010 ‘Code Pastoral’ Help Herders in Central Niger? Land Rights and Land Use Strategies in the Grasslands of Abalak and Dakoro Departments,” p. 64.

兵) 滥用暴力; 另一方面, 恐怖分子能够利用这种局面, 通过挑起族群冲突及不满情绪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地方融合。^① 随着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指数不断攀升, 尼日尔正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同时, 恐怖组织不断向萨赫勒南部地区扩散, 进一步威胁到几内亚湾国家的安全。

首先, 尼日尔是萨赫勒地区难民的主要过境国和收容国, 一直对马里、布基纳法索、利比亚等国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由于萨赫勒地区安全形势急剧恶化, 尼日尔收容难民的数量不断增多, 人道主义援助工作面临巨大压力。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 2022 年尼日尔收容了超过 71 万寻求人道主义援助的平民, 其中难民占比 36%, 国内流离失所者比例高达 53%。^② 而且, 寻求人道主义援助的平民数量和难民比例均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这不仅给尼日尔带来巨大压力, 而且使安全形势更为严峻。

其次, 自 2015 年成立以来,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通过挑起族群对立, 趁机招募富拉尼族和图阿雷格族激进分子, 以便更好地控制边境地区。这一行为已经引起豪萨人和杰尔马人的警惕, 他们成立了蒂拉贝里和平、安全与社会团结联盟委员会(Comité Union Tillabéri pour la Paix, la Sécurité et la Cohésion Sociale), 呼吁建立自卫团体。人们尤为担心尼日尔可能走上同邻国布基纳法索和马里一样的道路, 这两个国家的恐怖组织和自卫团体通常以族群为基础进行招募, 导致族群间杀戮的恶性循环。^③ 总之, 在此趋势下, 族群不断分化导致暴力冲突逐渐升级为恐怖组织与自卫团体之间、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之间的对抗。族群冲突恐怖主义化趋势不断增强, 进一步加大了反恐难度。

最后, 近年来恐怖组织与极端势力不断向蒂拉贝里西部和南部扩散, 以该地区为跳板逐渐向布基纳法索东部和贝宁北部蔓延, 已经影响到几内亚湾国家的安全。据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报告, 恐怖分子已经在贝宁北部扎根。2021 年 11 月—2022 年 9 月,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在贝宁北部地区共发动 28 起有组织的政治暴力事件。^④ 几内亚湾安全局势

-
- ① Morten Bøås, Abdoul Wakhb Cissé and Laouali Mahamane, “Explaining Violence in Tillabéri: Insurgent Appropriation of Local Grievances?”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55, No. 4, 2020, p. 130.
- ② UNHCR, “Country Operations – Niger,” <https://reporting.unhcr.org/operational/operations/niger?year=2023>, accessed March 15, 2023.
- ③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urder in Tillabery: Calming Niger’s Emerging Communal Crisis,” *Crisis Group Africa Briefing*, No. 172, 2021, p. 7.
- ④ Leif Brottem, “Jihad Takes Root in Northern Benin,” ACLED, September 23, 2022, <https://acleddata.com/2022/09/23/jihad-takes-root-in-northern-benin/>, accessed March 15, 2023.

已经受到萨赫勒地区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外溢的影响，打击恐怖主义迫在眉睫。

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的治理路径

蒂拉贝里地区的安全问题一度被尼日尔政府视为主要影响少数游牧群体的小规模土匪活动，但“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巧妙地利用了当地内部矛盾，短短数年内就实现在该地区的渗透和扩散。随着近两年该地区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尼日尔政府不断采取新的安全治理措施，取得一定成果，例如积极促成与恐怖组织头目的和平谈判，并在蒂拉贝里某些地区休战；使用无人机追踪恐怖分子，联合空军对恐怖分子实施精准打击。然而，该国反恐前景不确定性极大，反恐局势不容乐观。为了确保反恐工作稳步推进，尼日尔需要制定长期的反恐战略，提高治理能力及反恐政策的执行效率，确保从根源上解决恐怖主义滋生与蔓延问题。

首先，尼日尔政府应当对边境民生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尤其需要安抚牧民群体。国家忽视牧民利益导致他们普遍感到被边缘化，陷入安全困境和生存困境，逐渐丧失对权力中心的信任，最终选择投靠“圣战”阵营。针对这一问题，尼日尔政府需要完善现行《农村法典》和《牧民法典》，如对耕地与牧区的土地划分做出明确界定，合理分配不同游牧族群对土地和水资源的使用权。另外，尼日尔政府需要给予牧民更多关怀，提高对牧业的重视程度，增加牧业投资，加快促进畜牧业转型，以便缓解政府与牧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出现公共卫生危机等情况时，国家也需要充分考虑边境地区游牧民的生产需要，适当放宽市场政策或提供绿色通道，发放畜牧业补贴，切实保障游牧民的经济利益。

其次，为了缓解族群冲突，尼日尔政府需要加快建立国家认同，促进民族融合，以便更好地维护边境地区安全。尼日尔族群众多，资源争夺是导致国内族群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在蒂拉贝里地区，族群矛盾被恐怖分子利用，导致当地暴力冲突向恐怖袭击转化，恐袭事件持续增多。因此，在缓解农牧民矛盾的基础上，尼日尔政府还应充分意识到促进民族融合及建立国家认同的重要性，为当地民众，尤其是富拉尼人提供就业机会，鼓励他们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事业，改善他们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帮助他们树立积极正面的民族形象。同时，尼日尔政府也应从学校教育和语言政策入手，加强对国家认同的培养，提高不同族群之间的包容度。尼日尔政府还需要加强网络安全治理，监管社交媒体上宣传恐怖主义、煽动族群对立的言论，加大力度宣传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从意识形态层面巩固国家统一。这样，蒂拉贝里地区才能实现军民联合，形成以安全部队行动为主、民众自卫团体抵抗为辅的联合反恐阵线，从根源上遏制

恐怖主义向蒂拉贝里地区渗透。

再次，继续通过对话协商鼓励“圣战”分子回归当地，同时招募民众加入安全部队，推进不同族群间合作。蒂拉贝里地区部分民众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才加入恐怖组织，因此为了鼓励他们回归，尼日尔政府应制定相应政策解决他们的担忧，如提供工作机会、发放粮食补贴。巩固和平高级管理局曾积极促成“圣战”分子和平回归，但由于政策执行不力，少数族群与政府之间的隔阂反而加深。因此，该机构需要吸取教训，加强不同组织与机构的内部协调，构建健全的政策执行体系，确保安全部队在招募过程中秉持公开、透明、合法原则，杜绝贪污腐败和族群歧视导致的不公平现象。此外，在鼓励安全部队与当地民众加强合作的同时，该机构也应积极调解族群纠纷，促进不同族群融合，以便助力军事反恐，保障民众安全。

最后，加强联合反恐行动的协调与规范，积极联合域内国家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在蒂拉贝里地区，安全部队侵犯人权的事件屡有发生，导致民众对军队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愈发抵触反恐行动。因此，为了缓和军民间紧张关系，尼日尔政府有必要制定更加严格的军事行动规范，建立健全反恐行动监督体系，加大对侵犯人权事件的处罚力度，确保安全部队的行动更加谨慎，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民众生命安全。另外，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指出，2022 年上半年“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在尼日尔与布基纳法索交界的特拉省（Téra）、戈特耶省（Gothèye）和托罗迪省（Torodi）^① 变得更加活跃。这一转变（尤其是“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可能是它们在法国军队重新部署到尼日尔后作出的战术决定。此前，法国军队的行动多集中在蒂拉贝里北部和塔瓦（Tahoua）西部。^② 针对恐怖分子不断转移阵地的战术，尼日尔安全部队需要充分利用当地情报网，密切监控恐怖分子行踪，及时调整反恐策略和行动路线，积极同域内国家开展联合反恐行动，以便实现对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的即时、精准打击，遏制其向几内亚湾地区进一步蔓延。

余 论

本文基于价值累加理论对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问题进行分析，发现该地区

① 此三省均位于蒂拉贝里地区西部，靠近尼日尔与布基纳法索的边境。

② Hédi Nsaibia, “10 Conflicts to Worry about in 2022: The Sahel Mid – Year Update,” ACLED, 2022, <https://acleddata.com/10-conflicts-to-worry-about-in-2022/sahel/mid-year-update/>, accessed March 20, 2023.

安全局势恶化是矛盾累积的渐进过程，受到内外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实际上，蒂拉贝里地区面临的困境不是个例，农牧民矛盾、族群冲突、恐怖分子侵袭、国家治理不善、安全部队侵犯人权等问题是整个萨赫勒地区的通病。探究该地区恐怖主义，有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局势，进而对地区安全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面对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危机，域内国家需要提高治理能力，尽快缓解农牧民矛盾和族群冲突，增强社会凝聚力，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反恐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同时，考虑到恐怖分子未来的活动趋势，国际社会也需要积极应对，制定下一步安全治理策略，防止萨赫勒南部地区安全局势恶化，遏制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向几内亚湾国家继续蔓延。

最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中非合作日益深化，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的扩散也威胁到中国海外利益。面对尼日尔及整个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困境，中国彰显大国担当，在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中国企业利益的同时，向该地区提供多方面援助，促进其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这也是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的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贺杨）

dimensional African security perspective of state/non – state participation and direct/indirect violence, African security issues ar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direct violence with state participation, direct violence without state participation, indirect violence with state participation, and indirect violence without state participation. Using the two – dimensional security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Africa in recent years, it was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violence between African countries and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local separatist armed forces, and opposition armed forces in direct violence involving countries continued to increase. Among them, conflicts with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have caused the highest number of deaths, with the larges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deaths; The direct violence without state participation has the highest number of civilian deaths, with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being the main source of violence; Among the indirect violence involving countries, the most noteworthy is conflict induced violence, which mainly occur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the Tigray region, and Chad.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issues, African countrie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addressing indirect violence with state participation while making rational use of direct violence, and actively implement policies to change the “weak country” status, minimizing incidents of violence without state participation.

Keywords: African security; two – dimensional safety perspective; traditional security theory; non – traditional security theory; direct violence theory; indirect violence theory

Authors: Zhu Weidong, Research Fellow at Institute of West –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China – Africa Institute (Beijing 100101) ; Luo Ziheng,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An Analysis of Sahel Terro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 Added Theory : A Case Study of Tillabéri Region of Niger

Qi Zhaoyuan and Xu Jiaxi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central Sahel has deteriorated, the Tillabéri region in northwestern Niger has been affected by terrorist forces. Since 2018, the region has seen a high number of terrorist attacks, resulting in a large number of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damage. The radicalization of terrorism in the Tillabéri region is the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such as weak governance, conflicts between farmers and herders and intercommunal violence. Countering terrorism in Tillabéri requires not only the cooperation of Nigerien and international military

forces, but also the initiative of Nigerien government to ease conflicts from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aspects, in order to gradually achiev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 Based on the “value – added theo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adicalization of terrorism in Tillabéri, which is helpful for in – depth analysis of the complex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and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s for security governance in Niger and even the Sahel.

Keywords: Sahel; Niger; regional security; terrorism; value – added theory

Authors: Qi Zhaoyu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European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061); Xu Jiabin, Post – graduate Student at School of European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An Analysis of Cabral’s African Marxist Thought

Zheng Xiangfu and Zhou Tong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eaders of the anti – colonial movement in Africa, Amílcar Cabral founded the African Independence Party for Guinea and Cape Verde and led Guinea – Bissau and Cape Verde to independence. Taking Marxism as a practical philosophy, Cabral analyzes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explores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mechanism of colonialism from the specific reality of Africa, providing a set of social development models for Africa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Western countries. Cabral’s African Marxism thought is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distinctive in characteristics, which fills the gap of Marxist practice in “marginal countries” and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ause of human liberation and progress.

Keywords: Amílcar Cabral; African Marxism; scientific socialism; PAIGC

Authors: Zheng Xiangfu, Director and Professor of the African Marxism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0); Zhou Tong, Post – graduate Student at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0)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Al Jazeera in Africa: Historical Evolu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Discourse on China

Meng Lanjuan and Mao Jingyi

Abstract: As China and Africa work together to usher in a new era of win – win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in – depth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on certain issues, which can be partly attributed to the biased and deliberately misleading reports by Western media on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and